

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
工作会议交流材料

※※※※※※※※※※※※※※※※

开创高图书馆古籍工作新局面
为古籍整理作出更大贡献

※※※※※※※※※※※※※※※※

曾梦阳 丁小山

北京师范学院图书馆

1987年10月 日

开创高校图书馆古籍工作新局面。

为古籍整理作出更大贡献(初稿)

内容提要

曾梦阳 丁小山

本文从古籍整理与高校图书馆古籍工作的性质与任务。历史与现状。以及相互关系。探讨高校图书馆在国家古籍整理工作中的地位。作用和工作及其方法。

古籍整理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部分。是百年大计的长期战略任务。不仅是继承祖国宝贵文化遗产的十分重要的工作。而且是开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巨大信息宝库的伟大任务。

从广大读者和古籍整理工作者的需要出发。要整理的“古籍”应该是广义的。必须突破一九一一年下的限和古典装订形式的局限。要包括古籍的各个时期的各种版本。解放前、解放后的。线装的。平装的和精装的。白文。校点。注释。今译。辑佚。摘编以及选本等等本子。图书馆古籍工作应该适应这样的需要。进行改革。

“依托”高等院校整理古籍。首先看到高校有古籍整理专家。还应看到古籍——整理的物质基础——古籍的所有者管理者和古籍整理基础工作承担者的图书馆及其古籍工作者。不动两个积极性。很难取得较佳效果。

中国藏书史、图书馆发展史 古籍整理史和现实工作实践证明，古籍与整理者，古籍所有者，管理者与整理者，组织、联系形式愈密切，愈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工作进行得愈顺利，因此出成果愈快，其质量愈高，效益也愈大。

为此，必须统一认识，明确高校图书馆在古籍整理工作中的地位、作用；古籍整理依托高校（图书馆）要根据其特点和条件，采取各种组织形式；加强深化古籍基础工作；积极开展和改革加强书目工作；以及推动整理古籍的改革与现代化工作。

开创高校图书馆古籍工作新局面 为古籍整理工作出更大贡献

曾梦阳 丁小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古籍工作包括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带来了更为灿烂的春天。中央文件指出“古籍整理，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1982年恢复了古籍出版规划小组，同年九月国务院批准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根据中央指示“古籍整理可以依托高等学校”精神，1983年2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规划会议。

我们是这样理解以上精神的：

第一，古籍整理是国家的一项长期的战略性任务。现存古籍八至十万种（如果下限后移，加上一种书多种版本等因素，数量还要多）。“搞上一百年”，如果以85、86年整理工作的速度，每年500种计算，一百年出50,000种，约为总数的50—60%。

第二，古籍整理是继承祖国宝贵文化遗产的工作。继承是为了发展。古籍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有待大力开发的巨大信息宝库，因此，古籍整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高等院校是古籍整理的主要“依托”。

高校图书馆古籍工作者在完成古籍整理这一长期战略任务中的地位 and 作用怎样？应该相应进行哪些工作？是被动的图书馆资料供

应者，古籍的初级整理者？或是应该而且可以成为古籍整理的两个方面军之一。怎样承担和进行自己的工作？笔者试图以古籍，古籍工作者，包括古籍整理的性质任务，古籍整理的历史和现状出发来回答上述问题。

(一)

古籍著录规则明确“古籍，中国古代书籍的简称。主要指书写或印刷于一九一一年以前（含一九一一年），具有古典装订形式的书籍”。北大、武大两校编的《图书馆古籍编目》则规定“古籍主要是指一九一一年以前历朝的刻本写本、稿本、拓本等”。第一时间下限为一九一一年，第二装订形式是古典的，即线装为主。及其以前的卷轴装和包背装等。这是狭义的“古籍”。

广义的“古籍”，在时限和装订形式两个方面都要突破这个框框。李一氓同志在《古籍整理的几个新问题》一文中提出从几年来实践看古籍下限的“这个规定已经非突破不可”，“特别对历史部分不能拘泥下限之说”。我们图书馆古籍工作多年的实践，特别是读者工作，对单纯以时间和装订形式来划分为“古籍”，“普通图书”，“新书”，“旧书”这种不顾内容的划分标准，及其对读者使用这些图书造成的困难，与李老是有同感的。整理古籍，既要着辛亥革命以前的，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又要着解放后的，既要着中国的，又要着日本和其他国家的，既要着大陆的，又要着港台的，而图书馆有“古籍”，“普通图书”之分，或“新书”，“旧书”之分，或“普通图书”，“港台书”之分，由于条块分割，

图书馆员存在着知今不知古，知古不知今的现象，读者只好在这些被分割的部门，相应繁多的目录之间来回奔忙。单靠“咨询”或“专题目录”的帮助，简直是无济于事。总之，“古籍”概念应该从广义定义出发，那就是以内容为主，从读者学习研究需要出发，以时限为辅，“古籍”应该包括某任何“古籍”的各种版本注释、标校、今译本及选版本以及辑佚本等。

古籍工作包括采访、选购、交换，整理、分类、编目以及校注，标点，注释，辑佚等，典藏，排架，保护，装修等，流通，阅览，参考咨询，专目索引等工作。

整理古籍一般说有两个层次，第一在图书馆是分类编目，有了这个基础，才能进行校勘，标点，注释等等第二步整理工作。因此古籍整理是古籍工作的一部分，或者说一个环节。如果说古籍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那古籍整理就是它的一个子系统。相对来说校点，注释，今译等整理工作，又是古籍整理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因此古籍整理工作只有放到古籍工作系统中适当的位置，才能得到顺利发展。

(二)

古籍和古籍整理工作的关系是水和鱼的关系。鱼离不开水。古籍整理工作者，离开古籍，水平再高也将无所作为。他们只有与古籍密切结合，队伍才能成长壮大起来。这是近乎常识的简单道理，也是古今中外，图书馆史，藏书史和古籍整理出版史反复证明的事

实。即古籍和古籍整理者结合形式越密切，则成果越丰硕，培养出来的人才也越广博专深。

中国古代史官及其所服务的统治阶级贵族，垄断藏书，读书和著述的权力，因此管理当时国家图书馆的史官和贵族，既是典籍的所有者，保管者，又是典籍的整理者、研究者。

随着社会的发展，书籍生产方式的进步，私人藏书的出现，读书和著书述也由国家扩散到民间。孔子编定《六经》，应该说是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整理古籍活动。

在读书、藏书和著述的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垄断和人民反垄断斗争不断发生。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私人突破国家的垄断控制，民间私人藏书、读书和著述活动越来越得到更大的发展。

国家整理古籍往往在封建王朝建立以后，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时，由重“武功”转向讲“文治”，皇帝下令征集天下典籍进行整理。如，西汉刘邦建立政权之后，其经过“文景之治”七十年，到武帝，和帝先后下令征集典籍，国家图书馆得到很大发展，由刘向主持校书并负责校正六艺、诸子和诗赋三大类图书，任宏、尹咸和李柱国分别负责兵书、术数 and 方技三类图书。刘向之子刘歆根据刘向校书“叙录”编定第一部国家书目《七略》。再如清王朝，经过“康熙之治”以及雍、乾两朝的发展，出现长期经济发展局面，加上他们，特别是康、乾两帝为了巩固其统治，非常重视学习吸收汉族文化典籍的营养，非常重视古籍的整理，据《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38期来新夏同志整理的资料，以上三朝《官方整理的古籍要目》，校正注释12种776卷加二十四

史3, 259卷共4025卷, 简编, 新编, 摘编及续编31种4, 355卷; 丛书, 类书, 工具书9种90,856卷; 辑失11种846卷, 外《永乐大典》辑本383种。功可计卷的总数达96, 102卷, 几乎整理了乾隆以前的所有古籍。这是空前规模的。过, 是禁毁删改了一些古籍。

藏书楼和藏书家对保存和整理祖国文化典籍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既是藏书家又是古籍整理工作者和学者。他们藏书, 整理著述, 从数量和质量上远胜国家图书馆。这是因为, (一) 朝代更替国家图书馆藏书往往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而私人藏书家爱护书籍胜于一切, 在战乱中也千方百计保护藏书。即使其后代散出, 也多转手到其他藏书家。(二) 整理古籍态度比较客观, 不会因为政治目的而删改, 比较实事求是的保存和恢复了古籍的原貌。古代如两宋之交, 赵明诚、李清照夫妇是志同道合的藏书家。赵继欧阳修《集古录》之后编成《金石录》, 是著名的金石学家。李清照则是历史上著名的女文学家, 女词人。又如, 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題》, 著录了他所藏的51, 180卷图书, 比同时代的国家书目《中兴馆阁书目》的44, 843卷多6, 000多卷; 后者加上《续录》14, 943卷, 才多出前者8, 000卷。陈氏创《解題》书目形式, 是著名的藏书家和目录学家。近代如, 清末民国初年的杨守敬与他的观海堂藏书, 笔者有幸参加《杨守敬全集》的整理工作, 杨氏的一生是访书, 聚书的一生, 是读书、教书的一生, 是校书、整理出版古籍的一生, 也是著述的一生。藏书达数十万卷, 光绪庚辰(1880年), 东渡日本, 购回大陆久佚的和其它珍善本书

三万余卷。其中唐卷子本、古抄本和医书，实为国家瑰宝。他的著名的《日本访书志》，反映了这次重大的访求保存古籍活动，是目录学巨著，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见证。他的《水经注疏》反映他在历史地理学上的成就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有清末绝学之誉。杨既是大藏书家又是版本目录学家、金石家和书法家。他的全集将达20余卷（每卷50万字）。再如我们大家熟悉的藏书20余万卷的现代大藏书家，目录学的一代主将傅增湘，担任过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长，来自校书逾16,000卷，罕与伦比。著述甚多。《藏园群书经眼录》十九卷，收录善本4,500种，实为现代目录学巨著。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为保存古籍所作的不懈努力，如，在他倡议下，观海堂藏书成为国家的藏书。

历史上还有不少学者受聘为藏书家校书，整理古籍，成了著名的学者。有些人自己也成了藏书家。他们在藏书楼或国家图书馆通过工作实践，进行了良好的基本功训练，成为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如：缪荃孙与张之洞。又如：杨守敬与黎庶昌。

这里我要特别提一下著名的史学家和教育家翁独健先生。翁老对中国民族史蒙古史及文献史料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但他成长与图书馆的关系知道的人就不多了。他就读于燕京大学时，在校图书馆馆长洪业先生指导下，参加图书馆引得编纂处哈佛燕京学社主持的《道藏子目引得》的编纂工作，掌握了古籍整理的门径和工作方法，为成为学者打下了良好的古籍整理基础。他担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时，对北京师院图书馆的筹建非常关心。当时北京有些老中学藏有不少古籍和外文书。首都图书馆也有一些积压图书。他在繁忙的行政和

教学任务中亲自打电话联系。写条交我们去调书，反映他非常重视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建设。

解放前图书馆，特别是高校图书馆，许多著名学者或担任图书馆领导，或依托图书馆，对古籍整理和研究作出杰出贡献。如，鲁迅、陈垣、王重民——他们的事迹，都是图书馆界所熟知的，这里就不一一详述了。

就是解放后，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古籍工作在很长时间里被忽视，没有摆到应有的位置。但仍有不少古籍工作著作了重要贡献。如，北京图书馆李致中同志领导下的《析津志辑佚》，河南馆栾星同志整理的清李绿园的《歧路灯》，吉林馆金恩晖同志主编的《中国地方志总论》，《中国地方志方论》等。其他如工具书中，上海图书馆的《中国丛书综录》，杨海清同志的《中国丛书综录补正》，首都图书馆和北京师院图书馆合编的《全唐文分类篇目索引》，《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古籍善本总目》等都是图书馆同志对古籍整理工作的贡献。

在国外的图书馆里，“早期的图书馆员同时也是学者，他们不仅对藏书采取必要的措施，而且还对这些藏书进行研究”。（美）J. 谢拉《关于图书馆学的基本原理》。现代发达国家图书馆，都有许多学者专家，有些著名学者还担任图书馆领导，推动图书馆工作，如，1927年美国国会图书馆设立东方部，著名学者恒慕义博士（DR. ALTHOR W. HUMMEL）出任主任，开始更有系统的补充和研究中文图书。

(三)

图书馆古籍工作和古籍整理与出版。与其他文化事业一样，其发展要受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和政治形势的影响。从《1949年——1986年文史哲古籍出版统计表》急剧起伏的曲线。（附图着晴雨表似的反映建国以来经济的曲折发展和政治的风风雨雨。

1949年到1952年是建国后的经济恢复时期古籍出版甚少，这四年分别为2、3、16、4种。

1952年到1957年是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出版古籍分别为13、39、95、81、188种。1957年出现第一个古籍出版高峰，在经济上也是效果最好年分之一。为什么一年能增123%？1956年党提出“向科学进军”，周恩来同志提出了中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焕发了知识分子的青春，图书馆界和出版界为知识分子提供科研资料的需要推动，促进古籍的整理与出版。在政治上1950年的反右扩大化和1959年的反右倾，在经济上1958年的“大跃进”和以后的“共产风”，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撤走专家，致使

1959—60年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这一时期文化遗产至少进行过两次不适当的批判。古籍出版相应出现了第一个低谷，仅为1952年出版量的31.38%，一些打了纸型的书不能出版。1962—66年国民经济虽然得到了比较顺利的发展，但左倾错误在政治和文化思想方面还有发展。古籍1962年回升到97种

以后逐年下降，65年才18种。“文革”十年，我国政治和经济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66年仅5种，67—70年跌到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民经济和各方面工作走向恢复和稳步发展的道路，统计表的曲线，逐年上升古籍出版由77年的19种增加到138种，82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恢复以来，逐年上升，到1986年达541种，为1957年的282%。

图书馆古籍工作和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大体一样，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不过带有自己的特点罢了。五十年末六十年代初图书馆界总结56年以前这一段工作，往往提在指导方针上只强调了教育大众，提高人民思想政治文化水平，没有同时明确指出提供研究资料的重要性及其应有的地位。在实际工作中注意普通图书馆的流通，而对提供研究资料的工作做得不够，甚至忽略等等。古籍是作为科研资料的，理所当然得不到重视。这体现在许多多大量古籍的积压上。英文等外文书籍（俄文例外）也有类似的问题。这是为什么？有其深刻的政治、社会根源。新民主主义革命要革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命，当然要反对资本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不幸的误会是在它们要与古籍和外文书之间划上等号，而加以同样的敌视反对这样的误会在反左扩大化和反右倾的日子里重复出现。笔者和一些同志一样，就作过“厚古薄今”，“重外轻中”的检讨，文革十年更发展到令人荒诞的地步。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类似。这种现象日本在明治维新的年代里也曾出现过，当时把一向推崇的汉籍“视若敝屣”，杨守敬光绪庚辰（1880年）东渡日本购得大量善珍本古籍，正是赶上了这样的特殊历史条件的结果。

1956年党提出向科学进军，号召为知识分子提供科研资料。同年先后召开了全国的高等院校的图书馆会议，推动了为科研服务的工作。纠正片面为工农兵服务的偏向，古籍工作也因而进入一个兴旺时期。后来在左的思想支配下，不适当的把一些专家当作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批判，当作白旗来拔。这一时期的成绩主要是统一了思想认识，加强了古籍的搜集与整理，清理了大量积压的古旧书，开辟了古籍阅览室等。古籍工作者得到了一定的培养和锻炼。反右以后部分错划为右派的专家教师，被分划图书馆资料室，干部文化素质有所提高，严重的限制了他们积极性的发挥。事实上反左倾以后不少图书馆古籍工作陷于半停顿状态。文革十年更为严重和图书馆其他工作一样，陷于完全停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图书馆工作得恢复进入稳定发展的新阶段。古籍工作也近来第二更为灿烂的春天。图书馆根据自身条件，人大古籍研究所图书馆为依托成立了，原古籍组并入了研究所，补充了专家协助和执行校全校各单位的古籍整理计划。北京师大图书馆和北京师院图书馆不约而同，都开辟了古籍阅览（查阅）室。师院图书馆还按广义古籍的范围，将解放后重版或新的校点、注释、今译、辑佚等版本的古籍，不拘装订形式都抽一部供读者查阅。联合编纂书目索引，如师院图书馆和首都图书馆合编《全唐文篇目分类索引》。在编馆藏目录方面，师院图书馆还摸索突破狭义古籍的框框，按广义古籍范围收录解放后的各种版本的地方志。编出《馆藏地方志》续编。一俟条件成熟，即拟首先改进书名目录，以书名为标目，汇集一书的的各种广义古籍的版本，让读者更好的使用。

古籍。

(四)

开创古籍工作的新局面，高校做好“依托”。为祖国社会主义四化作出更大贡献。

1. 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开发祖国古籍这个巨大的信息宝库，让她更好的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明确高校图书馆在古籍整理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她不仅是古籍整理的基础，而且是在这基础上进一步整理研究的两个方面军之一。只有高校图书馆古籍工作者和学校其他古籍整理研究工作者，在共同的基础上，协同作战，(不是分庭抗礼)，才能作出更大的贡献。领导上应该在体制、人员、经费等方面给予必要的和有力的相称的支持和安排。

2. 秉着古籍与其整理研究工作者密切结合的原则。根据“依托”和古籍整理的两个方面军的特点和条件，采取以下不同的形式组织和协调本校的古籍整理工作：学校以图书馆为依托，成立《古籍整理研究所》(如华东师大、人大)，“古籍整理研究小组(委员会)”，由科研处或图书馆召集，协调整理研究统一的工作计划和经费分配问题等；由有关系所和图书馆古籍部门就具体课题签定协作议书，共同进行完成；图书馆设立课题研究室，提供资料，也可以参与研究；图书馆与兄弟馆协作，完成某些课题整理研究任务，充分调动两个方面军的积极性。

3. 加强和深化古籍基础工作；

在调查和研究大陆、港台，以及日本、美、英、苏等国家中国古籍整理、研究信息的基础上，制定体现本馆特色的古籍补充、补缺和馆际采购协作、交换计划，进行采访工作。

建立、健全和深化馆藏古籍目录体系。鉴于古籍数量增长慢，相对稳定的特点，以书本式为主，定期编《续目》增补。馆藏目录应第一，兼收解放前后的古籍的各种装订形式，各种版本及其校点、注释和今译等不同类型的著作。第二与《四库全书总目》、《四库总目标准》、《贩书偶记》、《贩书偶记续编》《古籍目录》《全国新书总目》《中国丛书综录》《中国丛书综录补正》《古籍善本总目》、以及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分目录》、《静堂文库汉籍分类目录》等书目联系起来，为采访古籍补充目录和补缺目录提供可靠依据。第三编制联合目录，为馆际协作资源共享提供检索工具，使咨询服务工作由日常的低层次的琐事中解放出来，提高咨询层次。

4、积极开展和加强书目索引工作。这是开发和传递古籍信息资源最为重要的任务。统一规划，联合行动，协同作战，由分到合。如北京师院资料室牵头的有十二师范院校参加的《中国语言文学资料索引》成立某一方面或某一专题的情报资料中心，面向全国。不但要搞人名、地名、篇名、断句、字词等初级综合索引。更要搞高层次的分类索引、主题索引等。前者如利用各种人名、传记资料引得通检、索引综合编出中国人民名（传记资料）综合索引，后者如《历代文篇名分类总索引》（在已出的《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元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即出的《全唐文篇目分类索引》的基

础上补编《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篇目分类索引》全宋文、全明文篇目分类索引，最后综合编出）。

5. 经常传播介绍古籍。古籍整理书目资料及推荐古籍好的版本信息。以文学史哲为例。1949—86年经过整理出版的古籍达3470种。许多读者，特别是使用古籍的老年读者，迫切希望了解这些信息。以专题形式，系统介绍书目、资料和好的版本，对于古籍整理将收事半功倍之效。

6. 古籍整理的改革和现代化。古籍整理第一要突破古籍1911年的时限和古典装订形式的框框。以读者使用图书馆资料完整快捷为原则。探讨和修正有关标准和与上述原则相适应的工作方法。第二要突破学校界限。加强横向联合使书目索引向分类积累、综合、总体方向发展。第三突破手工业工作方式。将索引原始资料集中并缩微提供阅览。进一步使书目资料索引编制服务计算机化。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 • *

这个课题提出的问题，几年来我们在工作实践中就在探索解决途径。今年春确定这个课题，陆续搜集了一些资料，又先后去人大图书馆和师大图书馆等兄弟单位学习参观，得到不少教益和启发，还准备进一步学习调查研究。原定年底完稿。考虑这次会议有交流机会，为了争取时间，那怕粗糙一些，不够成熟，不如拿出一个初

稿，请同行讨论、批评、指正，期能对古籍工作和古籍整理有所裨益。又，丁小山同志这段时间因有其他任务外出，有些观点未及交换意见，如有问题和缺点，应该由我负责。

曾梦阳

1987. 10. 5